



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 赵长茂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会议指出，今年下一阶段，要毫不放松常态化疫情防控，着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强调要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意义重大。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早在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我们对人民立下的军令状，必须全力以赴去实现。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

实实在在的目标任务，必须靠全力以赴、实干苦干去完成，这和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显然是不相容的。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经济社会秩序、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既定目标时间紧、任务重的当下，冲突就越发地严重。如果不能有效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导致我们的工作不扎实、数字不真实，完成任务达不到质量要求，那就不能说目标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就不能让人信服。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即使最后宣布实现了，也无法得到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认可。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驰而不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一对“连体婴”。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说到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大障碍。

我们党历来重视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若干制度和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出中央八项规定入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党风政风明显改善。党的十九大后，作风建设更加强调问题导向，更加注重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2018年9月，

中央纪委办公厅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让广大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线工作中。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必须常抓不懈、驰而不息，是因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像“牛皮癣”，十分顽固、非常难治、容易反复，又像“韭菜”，割了一茬又出一茬；还在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尽管被深恶痛绝，但通常不会归于政治问题，而被认为是方法问题，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收益大、风险低，当事者很少被追究责任。所以，变换“马甲”隐形变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是“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

把中央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要求落到实处。今年的“两会”是非常时期召开的非常会议，可以说是对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次再部署、再动员。在国内常态化疫情防控不可放松、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要在所剩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目标任

务，必须凝心聚力，通过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使干部队伍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扎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埋头苦干，集中力量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要提高各级干部的政治站位，深化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危害的认识。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官僚主义，实际上都根源于思想认识，因此继续加强干部队伍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很有必要。其次，切实改进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毛泽东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是上行下效。再次，进一步完善考核制度。考核必须严格，但也必须科学。完成目标任务，需要加大考核力度、层层传递压力，但前提是各层级职能清晰、责任明确，否则层层传递压力就会变成层层卸责，就会导致基层干部不堪重负。最后，让群众参与评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搞形式主义、有没有官僚主义，群众心里最清楚，感受最直接，最有发言权。所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群众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作为重要标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

□ 张占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从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跃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均居世界前列的社会主义大国。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占世界的比重大幅提高，居世界的位次不断前移，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占世界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脱贫攻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给我

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党带领人民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重大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国之发展，无疑是21世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重大历史事件。

然而，在国际话语论场，从我国发展创造的业绩来看，中国还存在着明显的“话语赤字”。以至于有一些外国人，从来也没有到过中国，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甚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认识水平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中国话语的崛起。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的自立自强，事关中国道路自信和文化主权，事关中国人民的尊严和责任。这就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切实扭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近年来，此项工作已有开展，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和努力，有不少起色。彻底扭转“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态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

第一，高度重视加强世界性议题的设置。一般说来，谁设置国际议题，谁就能主导国际议程。目前，我国学界在国际上成功设置并引起世界性讨论的议题有“一带一路”、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总的看还比较少。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很多，环境、民生、贫富、分配、经济、改革、开放、反腐败、反贫困等，我国都有成功实践。比如，我国创造了世界最伟大的反贫困奇迹，但还没有转化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反贫困理论。我国学界应强化世界议题设置，吸引国际学术界共同参与讨论，引领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大讨论。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就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经设立了一些相关重大项目，鼓励各学科专题研究世界性议题设置与提升国际话语权问题。这些工作还可以再加强。

第二，积极主导引领“涉中”的议题。在国际话语舞台“涉中”的议题非常多，但这些议题实际上大都是西方主导，总体上还处于“阐释中国”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到“中国阐释”阶段。存在着西方某些国家故意放火抹黑中国、我们被动灭火的局面。主导“涉中”议题，内容、标准、规则应该更多的由中国提供，是非对错应该听取中国意见，国际话语场应该有中国声音。主导“涉中”议题，关键是积极介入、提前介入，主动谋划，特别要加强在国际规范规制体系中设置议题的能力。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智库等研究机构统筹协调，精准开展国际“涉中”舆情研判，分类作好战略谋划和应对。

第三，提升对外交流的理论

和学术含量。推动中国理论和学术走出去，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的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专家出访，要尽可能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到所在国议会、大学等机构演讲，发出高质量的中国声音，这方面有新进展，但还可以再加强。组织、集中力量编写面向海外、多语种的“中国道路”等理论学术权威出版物，提炼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选择容易产生共鸣的故事。鼓励我国大学、科研机构与国外大学等共建国际性学术组织，以及中国研究院、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等，培养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加强国内外智库合作交流，在审批、经费和时间等方面给予更大政策支持。

第四，增强中国话语的亲和力

和公信力。过去我们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但还不够。要改变一厢情愿或自说自话，既不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针对不同受众，追寻共同之处，尊重当地文化，引发情感共鸣。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传媒集团和社会组织，探索语言学习和教育传播的新形式，注重用新媒体拓展话语传播和覆盖领域，把中国制度的优势转变为话语的底气，把中国发展的优势转变为话语的优势，在增强发声效能基础上下苦功夫，实实在在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以文育人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 丁元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以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滋养世道人心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国家的制度、体制中。“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文化具有影响道德风尚和精神教化的作用，必须把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塑造摆在重要位置，发挥文化价值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眼下，一些基层政府在积极探索“无讼”社区建设，这不仅是对传统社区关系模式的继承，更是从一个较深的层次探索社会建设的文化价值问题，它提出了什么是好社会的标准。好社会以及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通过社会自身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尽职尽责来解决社会问题。好社会犹如好身体，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消除疾病，保持活力。好社会是一种精神，也是一

种文化。文化表达社会存在，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化同时又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价值基础。

如果把人类生活比喻为一枚硬币的话，那么一面是“社会结构”，另一面就是“文化”。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内化于心的思维习惯。缺少了文化，社会治理就缺少了内涵。古人讲“以文教化”包含了人的社会化是要通过文化实现的过程和机理。

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文化价值基础

让每个人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就成为习惯。成为习惯的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是经过家庭和社区不断倡导，经过公众筛选而自觉遵守的东西。让每个人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其本质来说是心与心之间的沟通。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文明地与他人相处，推己及人，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婚姻、生育、家庭等是维系社会的重要制度。

父母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媒介，他们应当在家庭生活中通过自己的行为、言语、表情等引导儿童成为社会所期望的角色。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社会建设主要任务之一是实现家庭和谐。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建设相互认同和具有归属感的社区共同体。努力建设人民生活的共同体，让居民对社区形成归属感、认同感。社区建设的现实意义在于，人们通过社区互动形成相互认知和熟悉的安全网络，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和邻里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信任和严格社会监督。把居民，尤其是把孩子们纳入社区生活中，让未来一代在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社区生活中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治理好社区必须依靠社区居民。社区建设既是自治过程，也是法治过程。说它是自治过程，就是要给居民更大空间参与自治，处理好自身事务。说它是法治过程，就是要求居民守法。社区机制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需要个人坚守对集体的责任，有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机构。每个人坚守社会规范，把日常的小事做好，才会逐渐把社会和国家的大事做好，这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真谛。让我们一道建设邻里共同体，有了健康的邻里关系，才会有生

机勃勃的社会，才会充满凝聚力，才会有自己的认同感。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制度。党和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和推动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按照规则行事，并形成习惯性机制，实现预定的社会目标。党和政府通过政策和财政等制度安排，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活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给弱势群体以关怀，并在此过程中扩大就业、缓解社会矛盾。政府通过创新等方式，广泛调动社会组织、企业参与社会服务，激励公众关心社会事务，不断提高公众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公众和社会组织以自助、自治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治理，参与社会矛盾的解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经济社会发展事务和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三级职员）